



樊英峰
主
编

讨论会论文集 白重禹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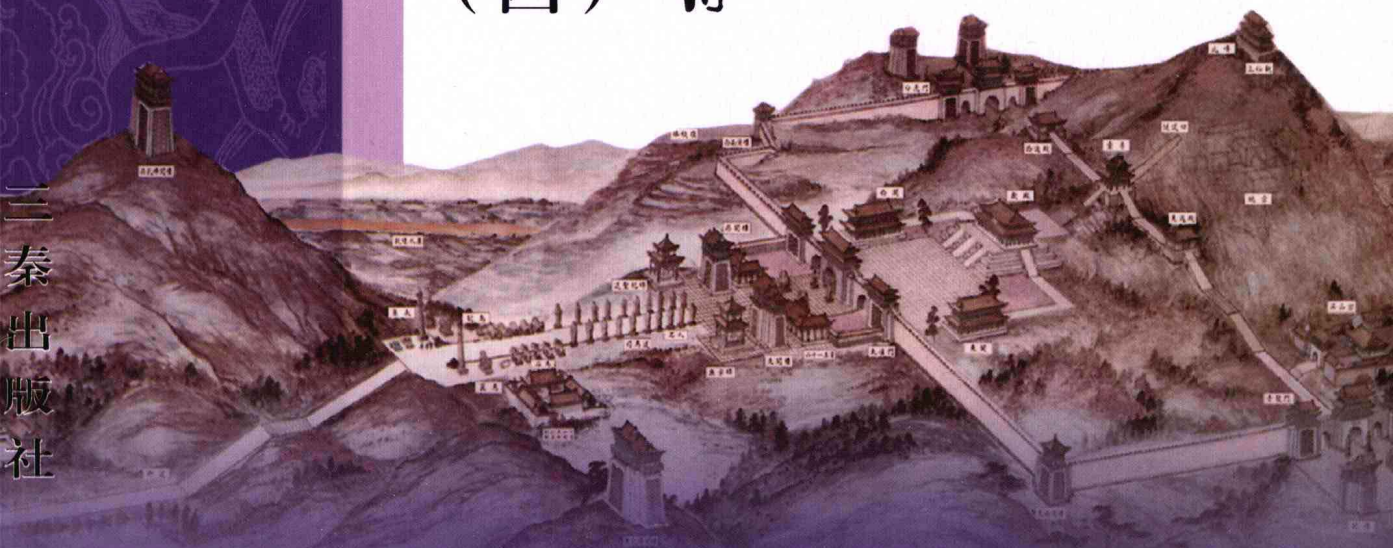


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學術

乾陵文化研究

(四)

三秦出版社



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736-492-4

I. 乾… II. 樊… III. 唐墓-研究-乾县 IV. 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8970号

乾陵文化研究(四)

樊英峰 主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中实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3.5
插 页	20
字 数	700千字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492-4
定 价	60.00元

《乾陵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兴邦 齐东方 张建林 赵文润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双怀 王晓莉 刘向阳 杨云善

梁 子 葛承雍 樊英峰

主 编：樊英峰

副主编：梁 子

编 辑：王双怀（特约）樊英峰

翻 译：冉万里

大 唐
在 此

乾陵博物館存正
馮驥才

国务院参事、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为乾陵题词。

目 录

研讨会简报

- 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致词 杜文玉 (1)
 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刘云辉 (2)

唐代胡人探索

- 何谓胡人 荣新江 (3)
 “胡人”亦或“少数民族”?
 ——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 李鸿宾 (10)
 长安胡人与唐代前期的婚俗文化 赵文润 (29)
 西域胡人探析 侯世新 (39)
 丝路胡人起源的相关问题 周永卫 (45)
 李唐王朝的胡人与胡俑 杨 泓 (52)
 唐代胡人与胡俑 高文文 (54)
 唐代长安胡人职业结构初探 路学军 (58)
 乾陵陵园中的胡人影像 樊英峰 (67)
 唐永泰公主墓壁画《胡人备马图》及相关问题 申秦雁 (70)
 腰刀与发辫
 ——唐陵陵园石刻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 张建林 (77)
 “髻面截耳与椎心割鼻”图解读 张庆捷 (85)
 唐代的昆仑奴与僧祇奴
 ——兼论出土文物中的昆仑奴形象 周伟洲 (93)
 昆仑商与唐的贸易
 ——从唐张籍《昆仑儿》诗说起 穆兴平 张 鑫 (101)



唐代胡俑研究

唐代胡俑	孙 机 (106)
丝路古道与唐代胡俑	葛承雍 (110)
几件与外来文化相关的唐俑	韩建武 (117)
唐代胡俑“袍”的领型	万 芳 (123)
从出土胡俑看唐代百戏	赵维娜 (131)
从胡俑看胡人在唐朝的生活	刘 潇 (139)
“丝绸之路”视野中的一件三彩骆驼俑	冉万里 (147)
从西安地区唐墓出土胡人武士俑看胡人在唐代的历史地位	刘呆运 (158)

唐代民族分析

昭陵十四尊蕃君长石像与唐太宗时期的民族政策	刘向阳 (165)
阿史那施(勿施)墓志笺证考释	
——兼论隋至唐初与突厥关系	朱振宏 (180)
唐代内迁月氏人的汉化	戴晓芹 (212)
唐代龟兹色釉陶的发现与研究	张 平 (218)
唐前期河曲地域粟特人“六胡州”治城新探	艾 冲 (224)
乳香之路	
——唐宋香料贸易	梁 子 (233)
唐代猛兽的进口与驯养	王 宇 (245)

唐代文化述论

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格局	陈丽萍 李青峰 (252)
从“全身遮蔽”到“靓妆露面”	穆兴平 魏 鹏 (262)
白居易“摩尼教诗”之可能性探讨	
——兼论白居易的宗教信仰	芮传明 (268)
唐代冥婚风俗新议	李诗语 (286)
唐李谨行墓周围圆形壕沟蠡测	贾二强 (294)
唐中后期军队长行制度考	贾志刚 (299)
唐陵石雕鸵鸟与中西文化交流	韩 香 (305)



从乾陵文物看唐代中西文化交流	陈 晔 (312)
从唐墓壁画中的琵琶谈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梁 勉 (318)
唐代长安的东市与西市	〔日〕妹尾达彦 (327)
唐《樊方墓志》《樊兴墓碑》与庆善宫考	曹发展 (378)
唐代博陵安平大房崔氏出土墓志考	柳金福 (393)
唐懿德太子墓双日临空天象图	秦建明 (420)

武则天与乾陵

解密武则天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	陈 洋 (425)
论社会舆论在武则天称帝中的作用	胡婷婷 (435)
武则天时期的“谋反”罪探析	陈巧凤 张剑光 (441)
武则天与唐代农业	杨向春 (450)
试论史籍所载武周改唐预言的真实性	王西坤 (459)
驳武则天研究中的几则臆说	郭绍林 (469)
唐代武、韦政权辨析：从二后祔葬问题说起	赵雨乐 (483)
唐乾陵内城北门石刻的考古发现与保护	宋少宇 (497)
乾陵陪葬墓“狩猎类”文物浅析	侯晓斌 (502)
桑原隲藏《考史遊记》所见乾陵、昭陵	(翻译) 张其林 (514)
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综述	刘向阳 李青峰 (520)
约稿启示	(526)



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致词

杜文玉

各位领导、先生们、女士们：

早上好！在此次会议顺利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乾陵博物馆和中国唐史学会对来自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亲切的问候，欢迎大家来到古城西安参加此次盛会。

今年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度，这次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亦是如此，同样也经历了一些波折。早在去年，乾陵博物馆就与中国唐史学会协商打算要举办一次主题为“丝路胡人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会，经过紧张的筹备，原计划在今年暑期召开，当一切都准备妥当，我们的会议邀请书发出后，却因为四川地震而不得不推迟，以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去。因此，今天的会议能够顺利地开幕，实属来之不易，其中包含着会议主办方及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与付出，我们对他们的辛苦和努力表示深深的敬意。

众所周知，大唐帝国是一个充满着开放和创新精神的国度，与世界各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长安作为大唐帝国的都城，居住着许许多多的外来人口，当然也包括大量的胡人在内，他们的职业不同，身份各异，活跃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长安同时也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通过这条通道来自于西域各国乃至遥远的欧洲的各族各国之人汇集到长安，不仅对加强中外经济交流，而且也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些原因，使得长安发展成为一个各国文化交汇、经济交流异常频繁的国际大都市，因此在长安及其周围地区出土大量的胡俑乃是正常现象，它们的大量出土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以上所述论点的正确性。这些胡俑不仅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为了充分地利用这些宝贵的文物资料，乾陵博物馆在陕西省文物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联合了省内各文物考古单位，举办了此次胡俑展和学术研讨会，不仅集中展示了多年来在这个方面的考古成就，而且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会议的召开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不仅使分散于各地的老朋友得以重新聚会，而且还可以结识许多新朋友，有利于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对主办会议方创造的这样一个机会表示感谢，并对他们为会议的召开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敬意。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取得更大更多的学术成果，祝与会的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在西安生活得愉快。谢谢大家！

2008年10月12日

（杜文玉，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刘云辉

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为了全面推动和繁荣丝绸之路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研究，提升对外文化交流的水平，配合“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乾陵博物馆今年8月6日开放的“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专题陈列，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乾陵博物馆承办、中国唐史学会协办的“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海内外学者共约70余人，分别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会议时间虽短，但经过与会学者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主办单位邀请各位专家参观了“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专题陈列，这个陈列是国内第一个以唐代胡俑为主题的陈列。本次学术讨论会学术气氛浓厚，进行大会发言的专家学者共有30人，他们分别就丝绸之路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关问题作了精彩发言，为本次讨论会带来了“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新动态、新思路和新成果。各位专家的发言积极而认真、热烈而坦诚，大家一致认为，胡俑是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艺术造型载体，是值得全人类共同研究、保护与记忆的一段历史、一份文化。

这次会议，是在全面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形势下召开的一次丝绸之路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的盛会，它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也为丝绸之路申遗做出了重要贡献。

奥运会后，会务事项比较繁忙，工作人员服务如有不到之处，请各位代表谅解。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陕西省文物局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对本次讨论会的支持，我宣布：“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胜利闭幕。

祝愿大家在今后的丝绸之路研究中再创辉煌。祝大家身体健康，返程愉快！

2008年10月12日

（刘云辉，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何谓胡人？

——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

荣新江

关于隋唐时期文献中的“胡人”所指，前人已经做过非常多的研究，看法虽然仍有不同，但大体上已经接近完善。有关的研究论著，不胜枚举，这里只举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以及最新的看法如下：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所谓“杂种胡”，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九姓粟特胡人^[1]。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在《萨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指出，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外国人，狭义的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2]。森安孝夫教授在最近发表的《唐代的胡与佛教的世界地理》一文中，根据《梵语杂名》、日本所存有藏文汉文对照题目的西域地图等材料中，强调“胡”指的就是粟特人，“胡姬”就是年轻的粟特女子^[3]。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问题。最近班茂森（Marc S. Abramson）出版《唐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一书^[4]，就是对唐代胡人和汉人民族认同的详细论说，值得参考。

过去学者在考虑隋唐史籍文献中的“胡人”所指的时候，没有注意民族认同中的“自认”（Ethnic Self）和“他认”（Ethnic Others）的区别和意义。其实，“胡人”的概念所指，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胡人自己的说法，同时也要参考其他民族的认知，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圆满的结论。以下就是笔者从唐朝时期不同民族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一下“胡人”所指为何。

1. 西域粟特人的看法

我们首先应当看看粟特人自己对于“胡”的认识。中唐人姚汝能所撰《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了一个著名的对话：

〔哥舒〕翰母尉迟氏，于阗女也。……〔安禄山〕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5]

我们知道，哥舒翰是突厥族突骑施部下的哥舒部落人，其父亲哥舒道元曾任唐朝的安西副都护，驻守于阗，娶于阗王女为妻，所以其母亲出自于阗王族的尉迟氏^[6]。安禄山一家的来源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从天宝八载（749）所立《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上安禄山以常乐为自家的郡望和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所云安禄山“本实姓康”来看，其家原本可能是从河西走廊的常乐郡（瓜州）迁徙到突厥地区



的康姓粟特人,其父亲娶突厥阿史德氏为妻,生安禄山,并为他娶了个地道的粟特名字,叫“轧荦山”,是粟特语 roxsan (rwxsan, rwyasn) 的音译,意为“光明、明亮”^[7]。其“母后嫁胡将军安波注兄延偃”,所以又冒姓安氏^[8]。因此安禄山说,他的父亲是粟特胡人,母亲是突厥人。

可见,在唐朝的粟特人眼中,西域地区的于阗人和粟特人都是“胡人”。20 世纪初叶以来,敦煌及中亚一些地区出土的于阗语和粟特语文献表明,二者都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分支,于阗人和粟特人也即伊朗种的胡人。在安禄山的概念里,突厥不是“胡”,粟特人、于阗人才是真正的胡人。

应当也是粟特人的天宝时期的名僧不空^[9],其所翻译的《宿曜经》中,有七曜日的三种名称,即“胡名”、“波斯名”、“天竺名”,其中的“胡名”据粟特语言学家的考证,实际就是粟特文的音译名^[10]。由此或许可以说,在粟特出身的空的眼里,胡即粟特。

2. 西域龟兹人的看法

天宝十三载(754)再度来到中原的龟兹僧人利言,中唐时在长安光宅寺住,以翻经大德、翰林待诏的身份,编写了《梵语杂名》。在《梵语杂名》中,“胡”字对应的汉字音译作“苏哩”,而“苏哩”应当就是梵文 sulī 的音译^[11],即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宰利”。玄奘把从羯霜那延伸到碎叶城(Süyāb),包括乌浒水和药杀水之间的昭武九姓诸国地区总称之为宰利(即粟特)。同一梵文词,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作“速利”,义净《梵语千字文》作“孙邻”,《大智度论》卷二五作“修利”。Sulī 来自粟特语的 suγdik,意为“粟特地区的人”或“说粟特语者”,是地名 suγda 的形容词形式。Suγda 在《后汉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作“粟弋”,《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作“粟特”^[12]。

利言和玄奘一样,采用梵文化的名称来指称粟特,其实“苏哩”就是“粟特”,那么他眼里的“胡”也就是粟特了。利言虽然是龟兹人,但他的说法应当代表了西域佛教化国家的普遍看法,也可能代表了印度人的看法,尽管目前我们找不到印度人或其他西域佛教徒谈到汉文“胡”与粟特对应的材料。

3. 西域于阗人的看法

我们有幸在和田地区古代遗址发现的文书中,见到唐代文献中的“胡”字。

英国图书馆藏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汉文文书 D. V. 6 (S. 5864)《唐大历十六年(781)二月六城杰谢百姓思略牒》云“阿磨支师子下胡书典阿施捺”^[13];又英藏霍恩雷收集品 M1 号文书《唐大历三年(768)毗沙都督府六城质逻典成铎牒》称:“右被镇守军牒称:得杰谢百姓胡书,翻称”云云^[14];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 Dx. 18921《唐于阗杰谢镇牒为杰谢百姓摊征事》有“牒得胡书状称”^[15];吐鲁番地区博物馆征集文书 2006TZJI: 036a《唐于阗某镇案卷为家畜事》有“被问见在百姓,



今得破沙苏越门胡书状称”^[16]。第一件文书的作者思略，又写作“斯略”，于阗文作 Si □aka，是杰谢当地于阗人的首领；后三件文书应当是杰谢镇的文书，作者有的是唐朝镇守当地的汉军官吏，有的因为残缺而不明作者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当地的于阗人还是汉人，都用“胡书”这个词来指当地通行的于阗语文书，这不仅仅可以从这些汉文文书的上下文中明显地读出来，而且与这些汉文文书同出的大量于阗语文书也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在于阗当地，“胡”指于阗，胡书指于阗语文书，胡人应当就是于阗人，这是和《安祿山事迹》相同的。推而广之，如果有当地的粟特人的话，恐怕也会被称作胡人。

顺便提一下，于阗人大概也是受梵文的影响，把“粟特”译作 sulī，复数为 Sūlya，按照利言的说法，就是“胡”。sulī 这个词的词义后来演变为“商人”^[17]，因为在于阗，粟特人最初就是以商人形象出现的。

4. 印度人的看法

《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记载：

（金刚智）开元己未岁，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后随驾洛阳，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岳渎灵祠，祷之无应。乃诏智结坛祈请。于是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师谨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气熿熿，天无浮翳。午后，方开眉眼，实时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远近惊骇。而结坛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场。质明，京城士庶皆云：“智获一龙，穿屋飞去。”求观其处，日千万人，斯乃坛法之神验也。于时，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闻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去。”数日，忽乘传将之雁门，奉辞，帝大惊，下手诏留住^[18]。

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唐朝下令驱逐所有外国蕃僧返回故国。当时在洛阳传法的印度密教大师金刚智拒绝领命，他说：我是印度沙门，不是蕃，也不是胡，所以我不必离去。在印度僧人金刚智的眼里，梵和蕃、胡有别，“胡”包括在印度之外的外国蕃僧中。

5. 突厥人的看法

对于汉文史料中的“胡”，突厥文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记载：“我在十八岁时率军攻 altı çub soydaq，在那里打败了他们。唐王都督（Ong tutuq）的五万军队到来，我和它厮杀于 yduq - bashe，在那里消灭了这支军队



……”《阙特勤碑》大铭文也说：“……生年十六岁，他建立了如下功勋以壮大我叔父可汗（默啜）的国家和权势：我们率军攻 altı ğub soydaq，战而胜之。唐王都督的五万军队到来，我们迎击。阙特勤徒步而战，以执武器之手抓获王都督的 jori ğ，连同其武器献于可汗。我们在那里消灭了这支军队。”据苏联的突厥学家克里雅施托尔内（S. G. Kljastornyj）的考证，altı ğub soydaq 指“六胡州”，altı 突厥语意为“六”，Soydaq（粟特）对应于“胡”，ğub 即“州”的对音^[19]。我们从唐朝史籍知道，“调露元年（679）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20]。实际上，这些突厥降户是指随突厥降唐的粟特胡人，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敦煌出土《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记录了与张君义同在景云二年受勋的二百余人，其中有含州安神庆、依州曹饭陀、鲁州康口、契州康丑胡^[21]；史籍记载开元九年（721）四月至八月反叛唐朝的六胡州首领康待宾、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康愿子等人，均为昭武九姓粟特人；考古发现的墓志，即洛阳出土《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菩）墓志》^[22]和宁夏盐池县西北约 48 公里处六胡州故地所出土《鲁州如鲁县人何府君墓志》^[23]，都证明从首领到一般民众，六胡州都是粟特人；还可以参考 8 世纪中叶至 9 世纪初诗人李益的诗篇《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24]。突厥文碑铭用 Soydaq（粟特）来对应“胡”，可见在突厥人眼里，胡就是粟特。

6. 唐前期汉人的看法

史籍中的相关材料前人都有举证，这里举敦煌写本中唐人的用法。S. 367《沙州伊州地志》云：

石城镇，本汉楼兰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627—649），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675）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

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卅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之城。

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

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25]。

《沙州伊州地志》虽然是晚唐光启元年（885）的抄本，但所据原本应是唐高宗时成书，武后、开元时略有增补的官修《沙州图经》。这里随康艳典而来的，应当就是粟特康国的胡人，所以这里明显的用“胡人”来指粟特人。而“新城”又作“弩之城”，



实际上，“弩之”就是粟特文 nwc（意为“新”）的音译。

7. 唐后期汉人的看法

敦煌出土的一件藏文—汉文对照书写的词汇表（P. 2762 = P. t. 1263），因为背面是《张淮深碑》的抄本，结合词汇表的内容，可以推断应当是吐蕃统治以后（848年以后）归义军时期的写本，藏文在前、后附汉文对应词，表明应当是汉人所用的文本。其中记有^[26]：

Bod 特蕃

Sog-po 胡

' A-zha 退浑

Dru-gu 回鹘

Lung rje 龙王

这里的 Sog-po 就是古藏文的“粟特”一词^[27]，可见晚唐敦煌人把粟特作为“胡”看待，而其他回鹘、退浑、吐蕃，甚至西域焉耆出身的龙家，都不被看作是胡。

通过上述观察，可以认同前人对于唐代胡人的下述定义，即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而狭义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具体来说，狭义的胡人主要指的是操伊朗语的波斯胡、粟特胡、西域胡（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之人）。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认为，胡人更狭窄的意思才是指粟特人，这或许不是一个原本就有的定义，而是因为粟特人在西域、中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当中存在的人数最多的缘故，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看到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所以慢慢就把“胡人”越来越多地放在粟特人身上，甚至一些文献就把“胡”和“粟特”划等号了。

在唐朝文献中出现的带有“胡”字的下述名词，如胡部、胡户、胡人、杂胡、杂种胡、羯胡，兴胡、兴生胡、商胡、贾胡，胡王、胡将军、胡酋、胡客，胡骑、胡马、胡马客，胡妇、胡儿、胡姬、细胡，胡店、胡食，胡妆、胡服、胡帽、胡锦，胡语、胡音、胡乐、胡曲、胡部新声，胡旋、胡旋女、胡旋舞、胡腾、胡腾儿、胡腾舞，胡天、胡神、胡袄、胡祝、胡律……等等，绝大多数，应当是指粟特胡人。

（附记：本文原文提交2008年10月11—12日乾陵博物馆在西安举办的“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现略加整理，提交给会议论文集，请读者多多指正。2008年11月9日完稿）

注释：

[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1—23页。

[2]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1963, pp. 4—5; 吴玉贵汉译本《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3] 森安孝夫《唐代における胡と佛教の世界地理》，《东洋史研究》第66卷第3号，2007年版，第1—33页。

[4] Marc S. Abramson, *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5]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3年版，第14页。Cf. E.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1955, p. 11; Robert des Rotours 标点译注本 *Histoire de Ngan Lou chan (Ngan Lou chan che tsi)*, Paris, 1962, p. 120.

[6] 《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新唐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参看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阐影响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7] 这是伊朗语专家恒宁 (W. B. Henning) 的看法，说见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pp. 15—16.

[8] 《安禄山事迹》标点本，1页；Robert des Rotours 标点译注本 p. 2 和 Pulleyblank 上引书 p. 7.

[9] 关于不空的粟特出身，最新的看法参见中田美绘《不空の长安佛教界台头とソグド人》，《东洋学报》第89卷第3号，2007年版，第33—34页。

[10] F. W. K. Müller, “Die ‘persischen’ Kalenderausdrucke im Chinesische Tripitaka”, SPAW, XXV, 1907, pp. 458—465; 吉田丰《ソグド文字で表記された漢字音》，《东方学报》(京都)第66册，1994年版，第329—330页，注89.

[11] 马迦特 (J. Marquart) 认为是钵罗婆语中的 Sūlik 的对音，参看马迦特《古突厥碑铭年代考》(Die Chronologie des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莱比锡，1898年，56页。

[12] 关于《梵语杂名》以下的对证，论者颇多，本文主要依据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71页，注1；收入作者《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注1。参看森安孝夫《唐代における胡と佛教の世界地理》，第4—7页。

[13] 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14] Hoernle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I”,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XX. 1 (1901), Extra No. 1, 1902, pl. III; 张广达、荣新江：《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铕牒跋》，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此据作者《于阐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15] 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又《于阐史丛考》(增订本)，277页。

[16]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9页。

[17]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61页；又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26页。

[18] 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19] S. G. Kljastornyj, “Sur les colonies sogdiennes de la Haute Asie”, *Ural - Altaische Jahrbucher*, 33, 1961, pp. 95—97;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作者《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第



83-84 页；参看森安孝夫上引文，5 页。

[20]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新宥州”条，中华书局，点校本上册，1983 年版，第 106 页。

[21] 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 年第 3 辑，第 331-341 页。

[22] 赵振华、朱亮：《安善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 年第 3 期，第 37-40 页。

[23] 《文物》1988 年第 9 期，第 56 页。

[24] 《全唐诗》卷二八二，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3211 页。

[25] 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91-93 页。

[26] A. Spanien et Y. Imaeda (eds.),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II, Paris, 1979, pl. 525; 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す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 14 号，1977 年版，第 39 页；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 4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7 页。

[27] Li Fang-kuei, “Notes on the Tibetan Sog”, *Central Asian Journal*, vol. III, n° 2, 1957-58, pp. 139-142; 杨铭：《古藏文文书 Sog-po 一词再探》，《西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100-103 页；又《Sog-po 源流考》，《中国藏学》1994 年第 1 期，第 88-98 页。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